

目 录

前 言	员
第一章 导论：黄炎培与他的几位商界朋友	员
第二章 张謇：对社会负责的经理人	愿
第一节 转入经商的道路	愿
第二节 经商理念——谋公众之利	愿
第三节 一生成就和时空条件	源
第三章 卢作孚：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企业家	缘
第一节 转入经商道路	缘
第二节 经商理念——现代化集团生活的试验	远
第三节 一生成就和时空条件	愿
第四章 范旭东：科学报国的实业家	员
第一节 事业特色和成就	员
第二节 经商理念——为社会服务	愿
第五章 陈嘉庚：把财富贡献给教育事业的侨商	员
第一节 为公众服务的财富理念	员
第二节 服膺社会主义的华侨旗帜	愿
第六章 黄炎培：为公不为私的伦理观（上）	愿

第一节 修学经过和文化本位	圆愿
第二节 个人修养	圆愿
第七章 黄炎培 : 为公不为私的伦理观(下)	圆缘
第一节 国家利益和公私之辨	圆缘
第二节 在社会上倡导人生修养	圆缘
第三节 对民营企业的期望	圆猿
第八章 近代中国儒商的文化渊源	圆怨
第一节 孔子与孟子的学说	圆员
第二节 范仲淹的榜样	圆缘
第三节 顾炎武与黄宗羲的思想	圆员
第四节 颜李学派的实学	圆员
第九章 儒商和社会主义	圆猿
后记	圆四

前 言

什么是儒商？目前学术界还没有明确的定义。本人的研究，也只是初步涉及这一领域。因此，本书大体上属于经验型的著作。即首先尊重事实，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作出初步的分析。

在研究黄炎培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他同近代的企业界人士联系非常密切。他本人系前清举人出身，有很好的儒学修养，对传统文化持肯定而不是否定的态度。他本人坚持来源于传统的道德操守，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但他所从事的乃是现代教育事业，并由此与当时的企业家建立起广泛的联系，他们在他们中间同样宣传自己坚持的“为公不为私”的伦理思想。这些都引起了我对现代企业家的伦理思想的兴趣。但是，黄炎培联系的各行各业的企业家非常广泛，不是以个人的精力和能力所能研究透彻的。根据社会上的流传，黄炎培曾传达毛泽东的话，肯定了四位近代的企业家，即张之洞、张謇、范旭东、卢作孚。事实上，根据黄炎培 1953 年 8 月 12 日的日记记载：“偕力子访李烛尘，因谈苏联彼得大帝电影片，有公正的批判。李烛尘述：毛主席说，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批判，中国张之洞、张謇、范旭东、卢作孚于经济建设有贡献的。”此记录与外界传说不同，毛泽东肯定四位企业家的话，是李烛尘告诉他的。除张之洞是晚清官吏，经营的是官办企业以外，其他三人都是民营企业家。而这三个人与黄炎培的联系，都非常密切。此外，与黄炎培关系密切的华侨商人陈嘉庚，是近代中国一位很突出的优秀人物，他也是得到毛泽东充分肯定的企业家。他们都是近代中国民营企业家中的优秀人士，是民营企业界的领袖人物。他们的伦理思想和行为方式，与儒学传统有着密切

的联系,他们之间也有着许多共同的特点。因此,本书根据自己的能力与研究方向,选择了张謇、范旭东、卢作孚、陈嘉庚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而以黄炎培的伦理观作为轴心,进行分析。他们是一个互相联系的、心灵呼应的群体,在民间对中国的现代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本书的研究范围,是对近代企业界人士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研究,而不是研究中国社会中传统的旧式商人与儒学的关系。这中间显然有重大的区别。

当然,对社会先进人物的研究,与对一个社会阶层或一个群体的整体研究,虽然是相关的,但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因而它不可能替代整体性的研究,而只能是为整体性研究,作一些铺路的工作。

除了张謇有“言商仍向儒”的自诩,其他人并没有以儒商自居。“儒商”的头衔,是我按照目前社会上流行的概念加上去的。由于对儒商问题的理论研究还不足,要对儒商进行定义,还比较困难,我在这里也只是作为一个形象性的模糊的概念来使用。之所以敢于大胆使用这个概念,因为这几位先进人物,至少可以归入最狭义的儒商范围之内。第一,除陈嘉庚属于华侨的特殊身份外,黄炎培、张謇、范旭东、卢作孚都不是从传统商人演变转入现代企业活动的,而是传统文化人(即士)转向现代企业活动。第二,他们都接受过相当系统的儒学教育,尊重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第三,他们接受儒学君子的社会责任观念,首先对国家社会负责,为了这一目的而进行现代企业活动的。第四,他们接受儒家把清贫看成美德的传统观念。即使个人掌握财富,也把财富用在公益事业上。儒商的概念,只是说明他们在发展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中受到传统儒家伦理观的影响,以及表明在此影响下,他们与西方资本主义伦理观的区别。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影响,也可以看到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特点。

上述几位历史人物,学术界作为个案,多有研究。本书是在学术界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把他们作为一个群体进行研究,发现了他

们的“儒商”特色和共性。本书通过研究,希望纠正过去历史学界把他们简单地归纳到“大资本家”、“民族资产阶级”行列的错误分析。对于这些不追求个人财富积累,甚至没有多少私人资本,为社会服务,过着简朴生活的特殊的企业经理人,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分析和历史定位。

第一章 导论：黄炎培与他的几位商界朋友

黄炎培(1878—1965年)是近代中国的一位教育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伦理学家和诗人,还参与一些企业活动,是近代中国民间事业的领袖,曾任民间的江苏教育会会长,他是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始人。他在民间发展现代教育事业的过程中,同民营企业家发生了广泛的联系,他的教育事业得到了企业界的广泛支持。他在教育和实业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黄炎培为了实现教育救国的目标,认真地学习和研究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根据中国的国情,特别着重于职业教育的发展,创建了中华职业教育社。他为使中国的读书人摆脱传统的读书做官的观念,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也为工商界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人才。黄炎培与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领袖张謇的关系非常密切,他把比自己年长一辈的张謇看作自己的导师,无论在教育上、政治上都有广泛的合作。他与近代中国化学工业的创始人范旭东虽然来往不是很多,但相知甚深。他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后起之秀——民生轮船公司的创办人卢作孚赞赏有加,时时关心着他的成长。他得到了华侨领袖陈嘉庚的高度信任和支持。他与金融界的张公权、钱新之、陈光甫,与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荣氏家族,与纺织业的杰出人物穆藕初,以及上海各个层次以至全国各地的民营企业家都有不同程度的联系。他创立的民主建国会,就是由教育界和企业界人士合作组成。但是,黄炎培作为

中国第一代以现代教育为职业的教育家,在文化、伦理观念上,仍然继承了儒家传统的大公无私的伦理观念。历史的进程,充满着戏剧性。黄炎培作为教育界的领袖人物(一度还被国民党扣上了学阀的帽子),摆脱了传统儒生的傲慢,与民营企业家建立起广泛的联系。但是,他并不代表民营企业家的个人利益,在“资本家”面前,反对自私自利,希望他们为公不为私,为国家牺牲自己,为民众谋求福利。他的伦理观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下,却能得到我们所谓“自私自利”的“资本家”的广泛响应,他也成为能够代表民营企业家的领袖型人物。

张謇(1853—1926年)是清末甲午(1894)科的状元,他以状元的身份辞官办厂,轰动了清末社会。他以艰苦卓绝的奋斗,成功地创办大生纱厂和大生集团,成为当时最有成就的民营企业集团。张謇自称“言商仍向儒”,因而不改儒者本色,以社会公仆自任。他在企业经营中,曾向投资人强调说:“要知人在一方,事业在一方,则其地之实业、教育、慈善皆吾责也。如是乃合共和之民。”^①因此,他不仅办厂成功,也领导了南通的地方自治和建设,成为地方现代化运动的领袖。

张謇是近代中国最典型的儒商,如果要对近代中国的儒商下一个定义,当然要以张謇为范例进行抽象。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说:“现今中国有没有儒商?需不需要儒商?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重要问题。但如说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张謇是个儒商,大约不会引起任何争议。这不仅因为他早已自我界定为‘言商仍向儒’,而且确实是从儒学营垒走进商界,虽已商化而仍然保留许多儒的本色。正如其他许多学派和宗教一样,儒生群体中也有形形色色的区分,有乡愿也有狂狷,有假道学也有真君子,有学而优则仕的猎官族,也有匡时济世的大丈夫……很难一概而论。但如商而冠之以儒,而且又是作为正面

^① 《垦牧手牒》,曹从坡、杨桐等编:《张謇全集》第3卷,第47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

人物类型来理解,则应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以诚信自律的伦理规范,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为夙愿的回馈思想,如果要求稍高一点,还应该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与优美情操,即所谓虽厕身商贾而仍不失其儒雅风度者也。”^①不过,张謇在现代企业中的地位,主要是经理人,而不是投资人,因为他个人没有从事资本积累,也没有向扩大企业投资的方向发展,他还很难称得上是个真正的资本家。

黄炎培从1902年起,在家乡从事教育改革,推行新式教育,从而参加了张謇领导的江苏学务总会(后改名为江苏教育会)的工作,并与之建立起密切的联系。1914年,他辞去了江苏省教育司长的官职,决心在民间更有效地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并于1917年创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这样一个民间的教育组织。他后来曾担任江苏教育会副会长,协助会长张謇工作,续后又继承了会长的职务。他和张謇一起推动了江苏的自治活动,并向张謇学习,组织公司,建设了上海到川沙的小铁路,这也是黄炎培经营的主要企业。1926年张謇逝世后,黄炎培撰送了一副挽联:

物则棉铁,地则江淮,盖其自任天下之重如此;着眼远处,着手近处,凡在后生,宜知勉矣!

早岁文章,壮岁经济,所谓不作第二人想非耶;孰弗我有,孰是我有,晚而大觉,尚何憾乎?^②

可见,黄炎培和张謇的心灵是相通的。张謇逝世后,黄炎培继承了张謇的事业,他以江苏教育会为中心,“自任天下之重”,成了江苏地区民间事业的领袖人物。

① 章开沅:《张謇传·自序》,第4页,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② 《黄炎培日记》,未刊稿,1926年9月22日条。

卢作孚(1893—1952年)与黄炎培相比,属于晚辈级的人物。卢作孚在青年时期,就与黄炎培有过联系,得到黄炎培的器重和关照。据他的儿子卢国纪回忆:1914—1915年间,卢作孚到上海考察,寻找人生道路时,认识了黄炎培,“这时候,作为他的挚友的黄炎培先生,很赏识我的父亲的德才,力荐他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但我的父亲认为自己不远千里来到上海,并不是为了谋取一个职业,而是为了寻求救国的途径,便辞谢了他的好意,没有去。但是,他却通过黄警顽先生的介绍,在上海参观了不少学校和民众教育设施,为自己从事教育工作,努力打下根基”^①。卢作孚与黄炎培有着经常的联系,他的事业获得成功后,黄炎培亲自到北碚进行过考察,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抗日战争期间,黄炎培对卢作孚的民生轮船公司面临的军务重担,也极为关注。

卢作孚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崛起,是中国企业界的后起之秀。有人评价他说:“卢作孚是一个没有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②在我们当代一般人的思维里,作为一个“大资本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是中国最大的民营轮船公司的老总和无可替代的领袖,但他本人不拥有巨额的财产。他简朴成性,当然他拥有的个人财产以及他只领一份工资的原则,也不可能支持他去享受现代生活。可以说,他确实是一个很难得的人才,但他是个很正常的常人,他周围有一个群体,他只是比较突出的代表。他是时代的产儿,也是中国文化的产儿。

① 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第24—25页,重庆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版。

② 转引自凌耀伦:《卢作孚文集·前言》,第15页,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原载美国《亚洲与美洲》杂志《卢作孚与他的长江船队》。

卢作孚比张謇小四十岁，比黄炎培也小十五岁。他已不属于接受过正规儒学教育的士大夫层级的人。他从十岁起，已接受新式教育，当然也就没有接受科举八股应试教育。因此，他已不是张謇那样绝对的儒商。但科举考试的废除和儒学影响的消除不是同一过程，更无论传统儒学影响下的社会伦理观念，是更深层次的问题。所以，从儒学的影响、思想和行为方式的演变、经商的理念等各方面综合考察，他仍然可以确认为是一个儒商。他在民间从事的事业也非常广泛，同时也参加过政府工作。我们把他看成继张謇之后，新一代民营企业事业的典范人物。因此，我们在以后的章节中，没有按照人物出场的时间程序来叙述，而优先予以考察，以便读者对近代中国儒商精神的延续性有一个清晰的时代感。

1952年卢作孚死于非命，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的黄炎培，写了一篇长长的哀词，为卢作孚鸣不平：

乌呼作孚！
君为一大事而死乎！
君应是为一大事而生，
君以穷书生乎无寸金，
乃大集有钱者之钱，
以创“民生”。
辛辛苦苦了卅年，
长江几千里，
内河几十道，
平时载客载货，
战时运械运兵。（按：指抗日战争——笔者）
责在人先，
利居人后！
有罪归我，

有功归人。

奇艰大难集中于君之一身，

君为何来？

为的是国家，

为的是人民。

终得从黑暗中眼见光明，

眼见全大陆的解放，

眼见大中华的复兴，

还运最后的奇谋。

七大龌龊，

完璧归赵，

而不居功，

而不求名。

乌呼作孚！

君其安眠吧！

君实为此大事而生。

作孚！作孚！

我是君卅年之老友。

我以爱君敬君之故，

曾历访君早年事迹于北碚，

于泸州，

于少城。

又曾多次为“民生”乘客，

实地察君所经营之事物，

所识拔所训练之人。

识君之抱负，

惊君之才，

知君之心。

呜呼作孚！
今乃为词以哀君之生平。
君其安眠吧！
几十百年后，
有欲之君者，
其问诸水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成立第三年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四日君既歿三十六日^①

这也是中国儒商精神的哀悼词吧！

范旭东(1883—1945年)是久大盐业公司、永利化学工业公司、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俗称永久黄)的创始人,也就是中国近代化学工业、化学研究的奠基人。从知识结构和行为方式上说,张謇和卢作孚还保留着传统儒生局限于政治、人文学科领域的特点,他们只是后来转入了组织工业化的经商道路。他们本身缺乏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以及技术操作和科学实验活动。而范旭东则突破了传统儒生的知识结构和动脑不动手的传统,他是个现代科学技术工作者。

范旭东比张謇小三十岁,比卢作孚大十岁,比黄炎培小五岁。黄炎培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结识了范旭东。黄炎培是一位能力极强的社会活动家,见一面就是朋友,大概由于工作上交集不多,联系很少,只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一起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工作,才有了密切的联系。范旭东的青年时期,正是新学的起步时期,他虽不属于极少数学习西学的第一代人,但仍然是属于近代中国早期少数转向学习自然科学的读书人。章开沅先生在谈到张謇经商时,说他有个“脱鳞”的

^① 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附录一》，第653—655页。

痛苦过程。因为传统儒生是圣贤之徒,不应该去经营谋利的事业。^①而儒生去从事体力活动,即使是技术活动,在那个年代,也是一个痛苦的“脱鳞”过程。在洋务运动的早期,有人主张应该选拔优秀的孩子去学习科学、技术。左宗棠就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人见西士技巧,卓越古今,以为华人学制(制造的制,非制度的制——引者),必须聪颖俊达之士。不知彼中均由匠人推择,并非士类求之。况中华学制本执柯伐柯,较之天工开物又自有别。使三千、七十之徒执贄般倕,不亦颠乎?”^②也就是说,圣贤之徒,怎能拜鲁班师傅为师?黄炎培在民国初年调查江苏全省中学毕业生,竟无一人从事农、工、商业,他指出:“盖社会积习重士而轻农、工、商,贵劳心而贱劳力,千百年养成之,非一朝一夕所能返。流毒之极,人人安坐享食为荣,非甚贫苦,不肯施其一手足之烈。以故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而毕业于农、工、商学校者,乃至舍而求为官,不得,则求为师以自慰。”^③据李喜所先生研究,与范旭东同时留学的学生,绝大多数学习文科,而军事、政法类学生则占了一半。1909年第3期《教育杂志》报道指出:“近日留日学生,大都趋向法政,愿习实业者少。”^④鲁迅本来是学矿务、铁路的,但那是要被人“加倍奚落而且排斥的”。到日本后转学医学,比较接近传统,然而他还不满意,认为“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他要学文艺改变人们的精神,转了一圈,回到了成圣成贤的传统轨道上。^⑤事实上,读书人以做官、搞政治为第一职业,直到解放前,这一

① 章开沅:《张謇传》,第93页,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② 《答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2,第37页。

③ 《职业教育实施之希望》,中华职业教育社编:《黄炎培教育文集》第1卷,第31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3月第1版。

④ 转引自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第145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

⑤ 《呐喊·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6—4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

风气没有根本转变。侯德榜呼吁说：“一个国家必须生活稳定，社会安定，政治优良，人民能安居乐业，才有人安心研究科学，才有人运用科学发展工业。科学家是牺牲者，不能做官搞政治。这并不是说科学工作者对政治没有兴趣，‘民主’是大家的要求，‘投票’是大家的权利，但科学家不必参加政治活动，因为科学家的性格和政治家不相同。一个科学家去参加政治的结果是：政治界并不在乎多此一人，而科学界的确少此一人。科学是绝对超然的，无国家、民族、语言之分别。德国希特勒不明此点，硬要科学工作者都是纳粹，大批人才被迫逃亡，终于失败。希望中国科学工作者能有超然的风度，国家如果能够得到和平，十年的安定，中国的科学必能大有发展。”^①所以，范旭东不仅从思想上，而且从行为方式上突破了儒家的成圣成贤、出仕做官的传统，也打破了轻视体力劳动、轻视科学实验的传统。这在当时的少数先进人物中也是少数。尽管如此，范旭东之从事实业，努力使国家成为一个近代国家，他仍认为是“书生之见”，而不是“发财之念”，也就是保持着传统儒生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伦理上继承了儒家的传统。

1945年10月，范旭东因病去世，正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黄炎培悼念他：

君来应为一大事，听到饶歌死亦安；
留与后生好模范，立身报国不须官。

黄炎培对悼词说明：“余交先生二十年，自同席参政会，得数共朝夕，暴日投降之夕，先生购《生命新观》一册以赠，谓有深意。某日午卢作孚君招餐，先生舍其所陪餐之客，而来陪我，纵谈时事，忧乐交

^① 侯德榜：《和平与安定——为中国科学发展之条件》，《海王》第21年第16期，第180页，1949年2月20日。

并,见于词色。不一月,先生下世矣。”^①他们之间的心灵是相通的。

陈嘉庚(1874—1961年)是一位典型的拥有个人资产的华侨资本家,在他的鼎盛时期,还是华侨中少数巨商之一。但陈嘉庚在青少年时期,接受过儒学教育,毕生也服膺儒学伦理。他虽然拥有巨额财富,但生活十分节俭,他把他的大量营业收入,投入到祖国的教育事业上,主要是创办了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作为资本家,他并不害怕社会主义,因为他早已把财产贡献给了社会,“惟自来抱社会主义,愿为公众服务,却为一生不移之宗旨”^②。他在海外辛苦经营的目的,就是要为公众服务,而不是为“儿孙作马牛”,他把财产贡献给了社会,却没有给子孙留下遗产。

黄炎培在民国初年考察南洋时认识陈嘉庚,1917年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陈嘉庚通过贾丰臻“斥万金助中华职业教育社,由是书简往还,殆无虚月”^③,与黄炎培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陈嘉庚于1919年以个人财力创办厦门大学时,黄炎培也应邀参加了有关活动,事后写了一篇《陈嘉庚毁家兴学记》,予以褒扬:“曩岁戊申,尝为文以记杨斯盛毁家兴学矣,二君者家之丰啬不同,其毁于学一也。而陈君年方壮,异时所效且无限。若夫二君之性行,盖有绝相类者。心力强毅而锐敏,不苟言笑。利害烛于几先,计划定于俄顷。临事不惊,功成不居,核于处物,而宽于处人。三五年来所见海内外成功家,大率类是。意者吾华民族之特性在是欤。然化于异族而不自爱其国,徇于私利而专以自肥其身,亦间有之。吾游集美乡,观陈君之所居,入门而圭

① 《黄炎培日记》,未刊稿,1945年10月21日。

② 《谈闽省教育》(1933年8月),王增炳等编:《陈嘉庚教育文集》第207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陈嘉庚先生演说词摘要》,《厦大周刊》十三卷十九期,厦门大学十三周年纪念专号(1934年4月6日),第5页。

③ 《陈嘉庚毁家兴学记》,中华职业教育社编:《黄炎培教育文集》第2卷,第27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

奚其形，循墙而伛偻其容，盖犹是先人之敝庐，未尝加一椽覆一瓦，其不私也如此。新加坡美人欲立大学，谋于君，君慨捐十多万金，而要以设华文科，凡华人入学者，至少读华文二年。约既定，更为募集数十万。君之散财，非为名高，非为情感，盖卓然有主旨如此。”^①抗日战争期间，陈嘉庚在南洋募款支持祖国抗战，日军占领新加坡后，陈嘉庚被迫避居印度尼西亚。抗战胜利后安全归来，1945年11月18日重庆举行了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黄炎培在会上说：“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②陈嘉庚把一生的心血都贡献给了社会。

当然，黄炎培在商界的朋友还很多，各人的人生定位也各不相同，并非个个都能为公不为私。但在黄炎培联系的商界朋友中，就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他们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发展现代经济事业，不谋求个人的私利，为社会服务。以上几位则是最典型的人物。

① 《陈嘉庚毁家兴学记》，中华职业教育社编：《黄炎培教育文集》第2卷，第27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

②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370页，新加坡怡和轩1946年3月25日再版。

第二章 张謇:对社会负责的经理人

第一节 转入经商的道路

张謇于1853年出生在江苏海门,一个既非官宦人家,也非耕读世家,没有士大夫的家族传承。耕读世家,是中国基层儒士产生的最坚实的土壤。但张謇的祖上是个既务农又经商的人家,对于读书成士的中国传统,他并没有家学的根底。当时的中国仍然是一个传统社会,但传统社会中,也已经有了儒商或商儒转换的风气。学者们已经证明,宋元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拥有财富的商人家庭出身的子弟转化为士大夫,已所在多有。道光年间,商业发达的湖州人士沈垚,不无夸大地说:“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①固然,读书人经商,是一个新的谋生动向,但由于中国的官本位体制,士为四民之首,商人拥有财富后,更乐意子弟向士大夫方向发展。

尽管如此,传统社会毕竟是一个身份、门第世袭的等级制社会,张謇想由一个农家兼小商人的子弟向士大夫转化,仍然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当地旧俗,祖上三代人没有秀才身份的人家,称为冷籍,家里出了个读书子弟,要想参加科举考试,就有种种障碍。因此,张

^① 沈垚:《费席山先生七十寿序》,《落帆楼文集》卷24,第12页。